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编者按：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

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笔谈作者按姓氏拼音为序）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建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亚洲模式”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在2009年12月宣布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正式公布了由双方学者分别就共同题目撰写的研究报告。而从这一刻起，我也终于可以回答关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人们一直在询问的问题：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

第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历史认识存在分歧的两国学者提供了阐述自己见解，了解对方观点，冷静进行对话与讨论的平台，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众所周知，中日历史问题是多年来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中日历史问题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内涵与外延在哪里？针对哪些历史问题的双方论述各是什么样的？在不同时期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经过全面、认真的梳理。

我们主张应以对话作为解决国际社会争端的基本方法，对于历史认识的分歧也是一样。在这一方面，曾经是战火频繁、冲突不断的欧洲在20世纪后期走向联合，建立起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EU），特别是曾经互为宿敌的德、法两国，编写出了共同的历史教科书，提供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欧洲模式，也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引起了关于“同一性”和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的讨论。2007年，我在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平格尔所长曾向我自豪地介绍从二战后就开始的德法共同历史研究，对东亚地区各国间仍然存在历史问题的争议表示忧虑。当时，我曾向德国的学者介绍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在为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而进行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如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成立“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情况；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举行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情况等。

当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工作刚刚开始，人们对于这一研究是否能够产生结果还拭目以待。我曾说过第一阶段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建立冷静和安静的环境，整理自己的思想，倾听对方的意见，进行初步的也是基础性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步是针对对方的意见进行研究，与对方开展讨论。研究与讨论的过程也是见解交锋的过程，但也可能是相互影响的过程；第三步是在

再度整理双方见解与认识的过程中,思考我们之间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同时也思考曾经是分歧但实际是误解的地方,思考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上述三步,也就是说,完成了中日解决历史问题的第一阶段,而且是关键的一个阶段。今后的任务是要思考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亚洲模式”。

第二,中日两国相关学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及战争暴行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近代史组的双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双方有关具体历史过程描述、认识与判断,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如战争原因的分析,侵略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等问题,双方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但是,双方对于1931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判断,关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损失,则有共识,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及其造成的大量中国平民的牺牲,留下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指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

一些媒体强调学术问题上的差异,耸人听闻地以“中日历史认识的鸿沟无法填平”为题加以报道,其实是舍本逐末。作为学术研究,当然需要在搞清历史事实,特别是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就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交流。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由此产生的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学术分歧并不等于中日关系的鸿沟,我们需要从积极的角度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对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一位美国记者指出:两国委派的历史学家第一次就存在诸多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冷静的研究,首次一致认为日军在战争期间犯有暴行,认为日本侵华的非法行为是两国间存在敌意的主要原因,这才是共同研究的主要成果。遗憾的是,日本与美国的媒体对此视而不见。

第三,廓清了中日历史问题的政治、学术与感情的三个层面,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我一直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交错的问题,这三个层面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完全重合。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者更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问题,需要遵循学术规范;学者也不可能没有情感,也不可能不考虑民众的感情,但作为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理性思维。

阅读中方委员的研究论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利用充分扎实的史料,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吸取国内外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每一结论都经过反复推敲;力图全面反映中国学者的学识、能力以及个性,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的变化,展示了中国尊重历史的态度。如在指出战后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及产生的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积极评价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进步力量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与努力;正面评价日本战后走和平道路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客观评价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关系,国民政府代表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交涉等。这样的研究消除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成见,对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记得在共同研究开始之际,日本保守的媒体称中方委员强调政治考虑,不可能提出有学术水平

的研究结果。而在报告公布后,右派对无懈可击的中方学者见解提不出任何批评,而过去经常批评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些国外学者,这次也承认“中国学者学术性很强的报告证明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程度”。

何理(国防大学)怎样评价中日历史问题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两国学者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能取得现在的成果是值得庆幸的、可喜的,它非常有利于推动中日两国国民、学者,也包括政界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步。

应当怎么样评价这次共同研究的成果,以及共同历史认知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我觉得这里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历史认知问题在整个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作用、地位等问题的历史定位。

历史问题,在当前中日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不同的历史认识,在两国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以及所有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中间,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敏感、那么重视,甚至成为国家关系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在国际外交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两方面。首先是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实在太严重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大量暴行已经成为中国国民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在我们军队,不少抗日老战士至今身上还有尚未取出来的日军子弹。试想,他们能忘却这段历史吗?我们的民族能不重视这段历史吗?同时,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和日本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奠定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及亚洲持久和平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和总结这一段历史是与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及亚洲和平安定紧密相关的。应当肯定,战后日本的进步历史学家对近代日本历史进行了基本正确的总结,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战争罪行进行了比较好的揭露与批判。但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右翼势力为代表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动向引起中国及亚洲各国的重视和警惕是很自然的。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特别是对侵略战争历史问题的态度以及一部分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和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否定,它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直接关系日本今后社会的发展,包括日本是否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在世纪之交,历史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更多的原因是日本社会发展的政治动向和亚洲和平安定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唯一和全部。因此,我们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还必须从中日关系的全局出发,既不可漠然视之,也不能过分扩大。不能说历史问题无所谓,这一页历史很快就翻过去了。事实表明,没有正确的共同认识,就翻不过去。但是,也不是历史认识问题一致了,其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正确的历史认识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交流和互动,这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已经取得的成果,我认为还是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中日双方发表的共同研究成果在影响中日关系最敏感的基本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比如,战争性质,进一步肯定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对一些非常敏感的重要历史问题,如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野蛮暴行在日方研究成果中都有了不同形式的表述,承认了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日本侵华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暴行和罪行。我认为在所谓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最难迈过去的几个“坎儿”上,基本上迈过去了。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也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同时,对于这次发表的双方研

究报告中存在的分歧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应当说,在学术研究中存在观点分歧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鉴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特殊背景和客观环境,在共同研究中必须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在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这是前提,达到这一点,我们的共同研究就达到了最基本的预期目标。同时,历史学家从不同史料背景、认识角度对一些具体历史事实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一有分歧,就把它政治化,无限扩大,这样就不能再继续讨论了。有些问题还要再深入,什么问题都政治化了,就没有办法共同研究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注意这一点。

胡德坤(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从时代的高度评价日本侵华战争史

我衷心祝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成果的发表。

首先,我认为中日两国学者,能够坐下来,对中日关系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观点分歧太大,过去是无法坐在一起讨论的。能够坐下来讨论,表明大家愿意在中日关系的历史方面进行共同研讨。

其次,尽管中日双方观点上仍存在分歧,但在研究方面,尤其是具体史料运用方面,力求客观。比如,对中日之间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具体表述中都能注意到对方的意见。

最后,这项研究成果虽非官方表态,但在引领国民历史观上将发挥重要作用。要加强中日友好,共同研究是很重要的渠道。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共同研究的贡献就会更大了。

我认为,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历史是时代的产物,因此,还应从时代的高度审视中日历史,指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中日双方最难认同的是1931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史。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来侵略中,持续时间最长、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最大的一段历史。它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时代的产物。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便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以巨炮重舰和廉价商品向世界所有落后地区发动剑与火的征服和扩张。资本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以侵略与掠夺为主的发展模式,简称侵略发展模式。在此期间,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向亚洲大肆扩张,从西亚、南亚、东南亚,到东亚的多数国家,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仅有日本学习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得以幸免。但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也同时继承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发展模式,而日本要发动对外侵略,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其近邻——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仍沿袭近代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模式,但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便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攫取殖民地,于是便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然维持着殖民主义的一统天下,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追求侵略发展模式,追逐更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法西斯,并相继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夺取政权,预示着帝国主义国家重新争夺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继续,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步骤,也是法西斯国家妄图征服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可见, 1931至 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不是日本一国的孤立行为, 是法西斯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历史进入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产品, 是帝国主义时代演绎出的悲剧。这在战时、尤其是战后已为世界所公认。因此, 如果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 全面审视评价这场战争, 就能比较容易地认同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在共同研究中增进了解扩大共识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告一段落, 中方委员和日方委员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论文。怎样来看待历时三年的这一项工作呢? 通过对一部分论文的研读, 我个人觉得, 这一段工作, 是取得了成效的, 是很有意义的, 是值得肯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第一, 是通过共同研究, 双方了解了在历史问题上各自的观点, 明确了分歧的所在, 以及形成分歧的学术依据和复杂成因。而这种了解, 正是加强沟通、促进交流、增进共识的必要前提。怎么看待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 一方面, 要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同的历史认识, 在一般性的学术问题上, 永远会存在, 在两国国内学者之间, 也并不是看法都完全一样, 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但是, 在一些重大的政治性、原则性问题上, 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确实会对现实生活, 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 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又要看到, 产生这些分歧, 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可简单从事。做好这件事, 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相互了解问题的所在, 弄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 对方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如果只是各说各的, 那就谈不上有交流, 有对话, 当然更谈不上逐步缩小分歧, 增加共识。我看日本学者的文章, 在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例如, 在讲到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时, 就特别强调了“在日本学界中的见解也存在分歧”, 同时还列举了中国学者的主要观点。在第三部第三章《历史认识与历史教育问题》中, 努力去观察和分析中日双方“历史认识各持己见”的背景和原因, 虽然有些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 但有些意见也值得重视, 如他们提出, 尽管日本政要和正式文件中曾经作过“道歉”, “为何没能给中国人强烈印象呢?”文章引用别人的话回答说: 这是因为“‘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和反对道歉的动态, 要大过道歉的声音’, 即阁僚等政治家的‘失言’、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等具体行为被视作问题, 抵消了反省和道歉的效果。”这样去思考问题还是有益的, 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 通过共同研究, 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例如, 日本学者的文章, 在谈到甲午战争时, 一方面指出日本学者中一般的说法, “是认为日本是贯彻侵略朝鲜、对华战争目标的见解”; 同时转述中国学者的意见, 强化了“日本从较早时期开始准备对中国战争、走上军扩路线”的观点。讲抗日战争, 标题就用了《日军侵略与中国抗战》。在写鸦片战争时, 也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等等。当然, 在大前提一致下若干具体论述与分析, 仍然会有许多争议之处, 如讲八国联军, 虽然承认“联军的总数约二万人, 日本军约占了半数”的事实, 但在描述日本军队的作为时却只是强调“义和团事件发生时, 致力成为‘文明国军队’而重视纪律的日军保护了总理衙门的档案”, 对当时作为侵略军队的日军给予中国人民的严重伤害轻描淡写。在讲到日本发动侵略时, 往往把责任完全归之于个别当事人, 并且不断强调这同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方针是相左的。类似这些问题, 显然需要经过长期的讨论, 在尊重历史真相的原则下逐步得到解决。

第三, 通过共同研究, 比较系统地发表并向日本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 这些有丰富史料根据(特别是大量引用了日文资料)的有说服力的学术见解, 必将在日本广大群众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沟通的渠道和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形式多样,规模空前。今后,要进一步扩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积极吸取国外学术界的优秀成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次由中日两国政府倡导、著名学者参与对一些专门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形式,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和尝试。实践表明,只要双方有良好的合作意愿,坚持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即使存在着学术观点的巨大分歧,也同样可以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亚洲与世界的视角看待中国共同历史研究

2009年12月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完成第一期工作,将正式公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2010年1月31日,中日两国同时公布了两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中文、日文各一卷),每卷均包括古代、近代两部分。至此,从2006年开始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最终完成了第一期工作。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像中日两国之间那样,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影响,甚至阻碍正常关系的发展,伤害两国国民感情的现象,虽非仅见,也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以来,日本国内一部分右翼势力逃避侵略战争责任,否认侵略战争事实,试图以掩盖和歪曲历史的方式,结束“战后处理”,摆脱历史包袱。这一历史认识经过少数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的言论和参拜靖国神社、批准否认侵略的教科书等行为,而在政治上放大和扩散,甚至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

因此,如何对待和认识历史问题,不仅是日本对于60年前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也关系到日本能否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否与亚洲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如何对待和认识历史问题,既是维护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前提之一,又是稳定东亚地区局势、促进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如何对待和认识历史问题,已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超越了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框架,作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将为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提供无可替代的公共产品,具有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意义。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学术层面上的科学研究,但实际上具有超出纯学术领域的3方面意义。一是,中日双方对于对方关于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一些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历史是非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有所接近,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二是,通过学术研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解读,形成了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认识。这一历史认识将有望作为思想资源,进一步推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和人民的友好往来。三是,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有助于国民建立正确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知。当今世界,国民对于历史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信息载体上所登载的浩如烟海的资讯,而媒体和教科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和准确,又以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成果为基础。

总之,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正常而稳定的发展,对于东亚和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平台

一、共同研究的意义何在

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既表现在全局性的历史观上,又体现在对若干具体事件的认识上。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历史观总是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等国

内因素的制约,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就如同外人不可能去改变日本的整体意识形态一样,外人也很难去改变日本的历史观。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当然希望尽可能地缩小历史认识的分歧,求得更多共识。然而,如果指望中日共同研究能在改正日本的历史观上取得重大进展,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以为,这也不是中日共同研究的发起者所设定的目标。

那么,第一阶段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它并不在于双方取得多大的共识,而在于彼此的了解更加清晰,双方都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对方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及对具体事件的解释。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不同声音的存在是一种常态,人们或以左、中、右,或以极端派与温和派予以区分。在诸多声音中,分贝最高且最能引起对方关注的往往未必是主流的声音,倒有可能是那些比较极端的意见。久而久之,民众常常会将少数人的极端意见视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而对对方真正的主流看法倒反而不甚了解。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彼此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机会。参加共同研究的学者,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其论文基本反映了中日社会的主流看法。阅读这些论文,大体上便能了解中日学术界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点,哪些不同点是一时无法求得解决的,而哪些不同点则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共同研究来求得共识。应该说,第一阶段共同研究为准确地对方社会传播主流的而不是极端的看法提供了平台,有助于加深两国学术界及两国国民对对方社会主流意见的了解。

二、共同研究的基本做法

中日在若干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这些分歧大致可分为3类层次。对于不同类型的分歧,共同研究展现了不同的应对之策。

一是带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形成基本的共识,否则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础。例如,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对此,日本社会存在着不同意见,极右者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在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中,也有主张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者,其理由是“侵略”一词的定义在国际法上并不清晰。对此,中国学者坚持,侵略战争一词必须明确写入双方的研究成果之中,没有这样的认定,共同研究便失去了继续进行下去的意义。日本学者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事实上,日本学者也表示,日本社会上认为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还是占多数的。只是,少数人的意见音量很高,对各方都形成了压力。

二是对历史进程的解释及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受各种因素影响,中日要在其中的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相当困难的。对此,中方学者采取了争取共识而不强求共识的态度,同时,不懈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不因共同研究而有所迁就。例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是否具有一贯性、计划性,对这一几乎贯穿近代历史的问题,中日学者在研究中屡现分歧。一般来说,日本学者较多展现事件的偶发性、被动性,甚至认为日方的一些行动是对中方刺激举动的反应。对此,中国学者坚持认为,尽管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就全局而言,日本的对华扩张趋势是明显的、一贯的,正是日本不断的扩张态势造成了中日矛盾的激化。对于这类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中日学者采取了各自表述的办法。

三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十分注意史料证据的准确性,一切皆以史料为依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证据则坚持,无充分证据则暂且搁置不提,而不囿于传统说法。即使是那些流传很广的有很大影响的说法,也不再坚持提出。我们认为,一些证据尚不充分的问题,不妨留待日后有更权威的史料面世时再作讨论。作为共同研究,其叙述必须建筑于严肃认真的基础之上,经得起彼此的质疑以及日后学界及社会的质疑。

三、如何面向未来

中日战争已经过去 65 年,不愉快的历史一页确实早该翻过去了。从国际关系的普遍实践来看,历史认识问题通常不会在两国的现实关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分量之重以至于有碍两国现实关系发展的现象,可算是国际关系中不多见的特例。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日本社会的一些人企图以错误的方式翻过历史的一页,他们企图以一种回避、掩盖甚至歪曲历史的方式来翻过历史,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中国社会对中日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因此,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是翻过历史一页的不二途径。正所谓,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这才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长久之道。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历史认识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到两国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学术研究等多个层面。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第一次由两国政府主导,委托学者正式组成委员会,对两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这是改善和推进中日关系的一个有益尝试,相信将会对促进中日相互理解和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根据 2006 年 11 月 26 日中日两国外长商定的实施框架,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 60 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以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互相理解。回顾三年来参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经历,我感到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原则和精神进行的。我也深深体会到:只有加强交流,才能加深理解;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寻求共识;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超越历史,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标。

虽然过去中日之间已有不少学术交流,但作为在政府主导下,两国主流学者的代表,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交流,共同梳理和探讨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尚属首次。通过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沟通看法,深入讨论,各自表述,互相评论,大大加深了互相的理解。日方能理解中国学者高度关注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并又不把学术问题情绪化。中方也肯定了日本学者对某些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且未因此而否定侵略加害责任。最后发表的共同研究报告书,有利于引导两国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和本质,避免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和情绪化。

在学术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即使本国学者之间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作为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尽管在日本有少数右翼势力企图否认日本侵略责任,为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翻案,但大多数日本主流学者都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基本事实,这也是共同研究的主要共识。当然双方在历史观、研究方法、史实认识、史料解读等方面还有一些分歧和差异,如中方学者重视探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和必然性,而日方学者更强调战争的过程和偶然性。总之,双方力求在尊重史实前提下寻求共识,但不强求在所有具体问题上都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对中日历史问题采取回避、搁置或绕过的态度均非良策,只有正视历史,才有可能超越历史。通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阐明历史的真相,就能更好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例如本人在共同研究中承担的中日互相认识的专题,就力图阐述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上,中日两国是怎样互相认识的;这种认识又是如何影响两国关系以至两国历史的发展;究竟哪些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了中日相互认识;我们今天怎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认识对方,以构筑更加健康、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而近现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更可以告诉人们如何才能防止军

国主义复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怎样才能超越历史,走向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和平合作的未来。

三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相对于要研究两千多年中日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时间实在太短。加之,还有许多史料收集、解读、分析和史实考证等工作要做。不少中日历史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因此,衷心希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工作今后能在第一阶段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的互相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

徐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与特点——中日双方报告书读后

历时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即将面世,这是中日两国史学界,特别是两国中日关系史学界的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中日两国史学界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民间学术交流于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逐渐恢复。1978年以后,两国的学术交往有了迅速发展,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语言交流上的便利,可以说今天两国史学界的学术交流相当频繁。所以,中日双方史学界对对方学的历史认识、主要学术观点和研究动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两国史学家在共同就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充分对话方面,过去做得还很不够。与民间的个别的学术交流相比,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这项研究是由中日两国的政府领导人倡议,由两国政府支持、推动,搭建学术平台,两国历史学家通过认真对话,设置论题,然后分别整合各自学界的研究成果,最后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两国的学术界和民众。这种在过去的研究中并不多见的研究机制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双方的学术立场和观点。

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在统一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历史认识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拉近了双方研究观点的距离,并以各自报告书的形式,认定了这些观点,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召集人北冈伸一教授最近指出:“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过中国,是‘加害者’。日本绝大部分历史学者也都承认‘侵略中国’和‘杀害中国人’的事实。”但是,以往不少日本国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通史书,特别是日本右翼人士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在侵华战争问题上都有意回避“侵略”一词,避重就轻地去考证和讨论“谁开了第一枪”和南京大屠杀具体伤亡人数问题。其实所谓侵略,就是指世界历史上出现近代民族国家以后,一个国家为了霸占他国的资源和利益,在未经他国允许的条件下,把军队派往他国,并发动战争。从本质上讲,在侵略事实发生后,无论加害方和被害方谁开第一枪,都不会改变加害一方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对“谁开了第一枪”问题和南京大屠杀具体伤亡人数问题的求证,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认识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次日方学者在研究报告书中对侵略性质的认定,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也应看到日方学者对侵华战争过程的记述与我国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日方报告书内对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残暴性和反人道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后,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极大伤害,遂使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当代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之一。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就使此次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双方的报告书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中日双方的报告书毕竟是两国史学家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科的范围内完成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双方报告书的性质不是一份政治纲领,也不是外交文件,而是融政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史学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学术性也是双方研究报告书的一个特点。在笔者看来,双方报告书的古代中世纪史部分包含了许多学术信息。双方学者在遵守共同的

研究原则,即“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既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差异反映了两国史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对于了解当前中日双方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古代中世纪史上的中日关系,了解该领域研究最前沿的研究动向,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中方报告书侧重论述近代以前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和特点,指出:“亚洲大陆文明,尤其中华文明为日本文化在几乎一切重要层面上的发生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促成其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同时,中方报告书也充分评价了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依笔者理解是指“独特性”和“自主性”),指出:“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另外,中方报告书还批驳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所谓“日本海洋文明论”的错误观点,指出这一学说“试图把‘日本的历史’描绘成‘摆脱中国化的历史’”,“虚构日本未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事实’”。总体上说,在古代中国文化和古代日本文化的定位问题上,两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比较接近的。此次日方报告书撰稿人之一的小岛毅更进一步指出:“从历史角度看,与其说‘大陆文化传到日本’,不如表述为‘由于大陆文化的传播才产生了日本这个国家’更加准确。”该论断可谓精辟之至。

日方报告书的研究视角比较强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至今仍是日本古代史学界主流观点的“东亚史观”(即“古代东亚区域整体史观”)和古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性”。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史上看,日本的“东亚史观”是为了克服孤立的“一国史史观”而提出的。“东亚史观”主张将日本古代社会和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放到古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同时,为了避免把古代东亚国际环境中的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描述成一种完全被动式的发展,继而又提出了“日本历史文化发展的独自性”观点,作为对“东亚史观”的重要补充。日本学界用“东亚史观”的视角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关系,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我国学者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期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迈出下一步

几年前看过一部由法国导演执导,德、法、英、比等几国合拍的故事片《今夜无战事》(又名《圣诞快乐》)。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攻到巴黎近郊,英法联军与德军交战士兵在对阵的前线共度圣诞平安夜的一段离奇又充满温馨的故事。互为敌国的法德士兵放下枪弹,爬出战壕,高唱颂歌,你递上巧克力,我送上香槟酒,德军帮助法军士兵回家探亲,法军掩护德国歌唱家逃离自己的国家……这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时,赢得很高的评价,在法国创下了高票房,并且被提名第7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法国和德国之间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至少曾三度被德国军队侵入过,一度还被德国占领,在事实上沦为了殖民地。这些历史不可能不在法国民众中留下阴影。但是,二战结束之后,两国政界、学界和民间共同努力,终于在1963年正式签署象征历史和解的《爱丽舍条约》进而共同主导了欧洲共同体进程;另外,还合作编写出版了法德共同历史教材。不难看出,这样一部超越民族国家意识的反战影片所以会由法国导演主导拍摄,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引起民众的热烈欢迎,可以说与法德两国政治家及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和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政治家也曾为两国历史的和解做出过努力。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包括中日建交和改革开放后中日青年大联欢等官方和民间交往活动的踊跃,都曾

极大地淡化了两国间由于历史上的战争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和迄今为止德国仍有新纳粹主义的思潮一样,当年日本也有右翼的捣乱,也有过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困扰,但都没有在根本上冲击两国友好关系和民间友好的氛围。整个1980年代,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积极实施对华援助(ODA),包括有偿、无偿和技术三方面的援助,总共提供给中国8000亿日元援助和部分无偿援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急切需求。在这一时期,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出现了历史最好的局面。一直到1990年代初,中国方面为了维持双方关系的这种友好发展态势,甚至还一度严格限制就历史遗留问题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发生争论。

中日两国因为历史问题发生冲突,严格说来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对于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变得不如冷战时期那么重要了。同时日本经济上遭遇困难,而中国的经济却蒸蒸日上,双方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摩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明显抬头,所谓“自由主义史观”逐渐流行,日本高官否认战争责任、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批准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频出,而中国又恰好国力迅速提升,网络、手机等信息传播手段普及,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政府意志受到牵制。两相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一方面也严重妨碍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

经过10年时间,中日两国重新开始回到历史和解之路上来,仍旧是两国政府努力的结果。也只有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才有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可能。因此,两国政府的态度毫无疑问仍将会对这一研究的进展和成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经历了10年之久的情感教化之后,如今两国民间舆情的氛围已经大不如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较前大得多的政治压力。要想谨守理想目标和学术原则,怕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想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几乎所有来华访问的日本政治家或学者,都能够主动承认日本历史上“侵略”了中国,日本早年的教科书承认这一点也毫无困难,如今自认为严守学术立场,不受政治左右的日本学者,却连要不要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中写上“侵略”二字都变得犹犹豫豫,其原因显而易见。同样的情况,中国方面无论学者,还是官方,不要说在共同研究中有所“让步”,哪怕有一句表述不合乎某些激进网民的预想,都必定会受到攻击,此种压力也难免会使中方在面对共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学术研究理当是个性化的,把中日两国部分学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就两国间历史问题找出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原本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两个国家的学者之所以能够坐在一起,就两国关系的历史共同讨论并得出某种一致的意见,根本上是因为无论学者研究的方法、角度及看问题的立场如何不同,客观的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法德两国学者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推出了共同历史教材,除了较好的政治环境与氛围外,也正是因为它们两国关系的主要历史事实是比较容易共同认定的。他们之间需要解决的主要是现代表述和评价的问题。从《今夜无战事》片头法、英、德各国小学生依照教科书高声颂扬自己国家,慷慨斥责敌国的场景,到影片最后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战争只是各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之间所需要的,士兵只是他们用来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工具——就足以看出今天基于人性立场出发的法德社会舆论,已经不会过多地纠缠于谁“侵略”谁、谁“伤害”谁这样的是非褒贬问题了。毕竟,德国占领过法国,法国也多次攻入过德国,心理上双方也很少有谁欺负了谁这样的历史悲情。

中日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除了中方具有强烈的历史悲情意识以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理当是在双方对两国关系上的主要历史事实基本达成共识后,双方共同坐下来解决不同的评价和历史表述方式问题。然而在事实上,中日两国学者至今还有一些很关键的历史事实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而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中一些问题又恰恰是中方学者至今未能做出科学论证的。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双方学者就坐在一起“共同研究”,其困难的程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双方共同研究历史,参加的中方学者基本上都是史学工作者,而参加的日本学者绝大部分却不是历史学者,双方之间交流与对话的难度自然更上层楼。

在上述种种复杂情况下,这次共同研究,双方能够求同存异,达成如此成果,已实属不易。坦率地说,在我看来,这次共同研究的最大成果,其实是开了一个好头,即双方都能基于和解的目的,做出各自的努力。日方学者公开承认存在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承认日本对中国有“侵略”的事实;中方学者在坚持存在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前提下,同意对死亡人数还有进一步做实证研究的必要等,都表现出了两国参加共同研究的学者敢于冲破政治禁忌和敢于担当的学术精神。尽管这样的共同研究依旧无法摆脱政治的困扰,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迈出第一步,相信一定也能够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直至像法德两国民众那样,中日两国民众也有达成真正和解的那一天。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研究中的不同

2010年1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作为中方委员之一,我翻检手头的工作日志和会议记录,回顾三年来共同历史研究的经历,感触颇深。

大约在20多年前,我就开始了以中国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为主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研究;从10多年前开始,又在北京大学教授相关的课程。期间,接触过大量的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到日本进行过长达一年的学术访问,还参加过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会议。但是,此次有幸参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却是不同的学术经历。作为最年轻的中方委员,我不仅从中领教了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感受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因而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根据分工,我主要承担近现代部分第二卷第一章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这是被俗称为“从“九一八”到“七七”(1931—1937)的中日关系史,又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按照“同一题目、各自表述”的要求,双方首先讨论、确定了共同研究的题目(“关键词”)。这些题目不但涵盖了该时期中日关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问题,也可以使共同研究有的放矢。随后开始了较长时段的双方各自的研究工作。我的初稿形成之后,首先在中方委员之间进行了讨论和修改,然后与日方学者进行了两次讨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定稿(“报告书”)。

在目前公布的报告书中,我们共同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扩大的过程及其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双方都注意到了卢沟桥事变以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互动性。中方论文从日本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战争准备的计划性角度,着重论述了七七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日方论文也重视了日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双方论文均注意到“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与虚妄性。这些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中取得的重要共识。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

1931—1937年间,中日关系的总体趋向是持续恶化和紧张,最终结局走向了全面战争。日本学界早有“十五年战争史”的说法,中国近年也提出了“十四年抗战史”的见解。故该时期的中日关系史,被置于第二部“战争的年代”之第一章。为此,我在论文中分3个阶段,主要论述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以及中国方面应变的历史过程,意在论证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必然性。日方论文虽然肯定这样的历史事实和基本过程,但较多地强调了事实的多样性、事件的偶发性、满洲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之间的断裂性,由此来凸现日中战争并非历史之必然。

从“九一八”到“七七”,中日之间事件多发、事变频繁,并伴随着局部的战争状态。如何认识这段史实?我在论文中重点论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侵略性,并指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

紧张、走向战争的主导因素；日本关东军、中国驻屯军以及驻华使领馆，则不过是这一政策计划的先行者和执行者。日方论文更多地论述了驻华日军以及使领馆（所谓“出先”们）行动上的独立性，并强调日本政府的无计划性和军部的独断性，还指出了中国方面的排日、反日因素及苏联等外部因素。我曾经在一次讨论中指出：如此舍本逐末、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难以诠释史实。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扶植下的伪满洲国，历时 14 年，内容横跨第二部。双方仅在此章进行了必要的论述。日方论文在不避其傀儡性、虚妄性的同时，较多地论述了伪满洲国进行的货币改革以及在工业化等方面的成就。对此，我方论文主要论述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经济掠夺与所犯的战争罪行，并论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进行的抗日斗争。

通过以上所举双方在此次共同研究中的不同，并结合近现代部分其他章节的共同研究情况，笔者认为关于中日战争的共同历史研究，中日学者除了在史观、史识上的分歧之外，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差异。

中国是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又是最后战胜者。这样的战争体验和结果，深刻地影响了 20 多年来中国学界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从这种“结果”出发而进行追溯式的纵向性研究，或者说为了阐释这种“结果”而必然进行的“原因”与“过程”的探讨，就成为中国学界基本的研究方法。故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始终存在两大热点领域——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对于战争原因的“单一化”和战争过程“单纯化”的研究倾向。

日本学界战后至今的日中战争史研究，以及相当部分的实证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则存在着日本学者也指出的无视战争“结果”而过分偏重于过程、原因的倾向。比如：1. 对于“满洲事变”与七七事变，过分强调中方的原因或事件本身的偶然性，而忽视或无视最终还是日方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将其扩大化为战争的结果；2. 对于伪满洲国，无视或忽视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负面破坏性结果，而仅仅强调与关注日本近代化的正面建设性作用；3. 对于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争罪行，无视给广大中国受害者造成的灾难与伤痛的结果，而强调加害者的理由或孜孜于考证这些结果的真实性；4. 在战争过程中，过分强调“和平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而无视最终还是由战场来决定的战争结果；5. 对于侵华战争，过分强调日本政府与军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元外交”或“多重外交”），而忽视或无视其最终的同一性和战争不断被升级的结果；6. 对于日本最终战败投降的“结果”，进行各种非结果性的论证。

中日两国学者为什么在方法论会产生上述倾向？其原因非笔者所论。但显然，如何克服上述倾向，却是两国历史学者共同研究“中日战争”所需要的方法论前提。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求同而存异，既是此次共同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今后继续进行共同研究的最好原则。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寻求历史共识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自 2006 年底启动以来，经过两国学者 3 年多的努力，现已形成第一阶段的成果，并公开发表了。我想，中日两国寻求历史共识将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由学者们迈出的仅是第一步，它是积极的、重要的，但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知道，法德两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已进行了 60 年，中美两国学者以合作方式系统地开展中美关系史研究也有 20 多年了。其实，中日学者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交流也不少，时间也不短；但可能不很系统，人们关注的也不够。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开展双边或多边的共同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已成为一种风尚。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启动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在我看来,所谓“共同历史研究”的“共同”有三重含义:一是指这段历史是共同的,是两国或几个国家的共同经历;二是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共同的,是由相关国家的历史学家合作进行的;三是指这种研究要寻求对历史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在共同研究的过程中达成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观点的简单接受。

在两个国家的交往中,学术交流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层次,它不同于官方往来,具有民间性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往来。作为学术交流主体的学者群,也比较特殊,相对国际化。这种特殊性使一些敏感话题在学术层面和学者间交流更容易一些。对同一段历史、对共同的经历,不同国家的学者很自然地会从不同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看法;但训练有素的史学家有共同遵循的工作原则,能够比较客观、比较理性地进行沟通。通过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各方就都有可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学术交流的成果可以对官方和民间两方面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可能更深刻、更长远。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交往渊远流长,从古至今两国相互间的影响巨大,中日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审视,友好是两国交往的主流,但两国之间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19世纪后期,先行进入资本主义的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是首先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之一。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972年中日建交时,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明了各自对以往战争的基本立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此后30年,两国关系又有很大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多方面和十分重要的帮助。

中日关系早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两国间的交往也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但双方相互间的了解还跟不上现实的需要,历史问题仍不时在两国关系中掀起波澜,影响着两国民众的情感,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这就使得两国学者坐在一起,冷静客观地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很有必要。学者们肩负的使命就是通过全面了解历史、正视历史,推动中日两大民族加强相互了解,跳出往昔的羁绊,以利两国关系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在共同研究项目起步之时,由中日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先采取这样一种办法,即分别阐述各自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急于寻求一致结论。这是个十分明智的选择。在论文初稿写出后,两国学者就彼此的观点展开讨论,随后又对各自的论文做了认真修改。作为第一阶段成果发表的论文包括古代和近代两部分。中方学者提交的论文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每篇论文都力求做到观点清晰,论证严谨。日方学者的政治倾向虽然不尽相同,观点也有所差异,但他们的论文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反映了战后日本史学界对历史问题的主流认识以及不同意见,其中不乏有见地的和有启发的观点。

共同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和所形成的成果虽然是初步的,但我认为有这样3点值得重视:

第一,双方对对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尤其在人们最关心的近代史部分。应该说,双方参加这一项目的专家原先对彼此的情况就比较了解,但通过系统的阐述和全面对话,双方都感到收获不小。中方阐述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日方多数委员的理解,一些误解和偏见消除了。日本学者的论述则有助于中国学者全面了解对方史学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准确把握其主流意见和不同观点。

第二,从起步阶段交流的情况看,双方存在着在求大同的良好基础。关于近代部分,经过反复

讨论, 双方学者就中日战争的性质判断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日方学者在论文中明确承认并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 并说明这是日本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依据各自掌握的史料和所进行的研究, 学者们也交换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但双方从大局出发, 没有陷入对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

第三, 将双方学者第一阶段的成果在两国同时公布很有必要。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两国的舆论界和民众全面了解两国学术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也有助于消除误解与偏见, 扩大和树立两国史学界主流意见的影响。

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是寻求历史共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两国参加这个项目的学者只是先行官。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的确有相通的一面, 但也有不同的一面, 人们对此往往认识不足。通过第一阶段的研讨, 两国学者都感到, 中日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是产生历史叙述的差异和不同历史认识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持续的交流和探讨, 才能在历史问题的各主要方面形成共识, 并使这种共识具有深厚的基础。这个项目还需要更多的关注、支持和更广泛的参与。

关于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认识, 我最后还想谈两点看法, 就是这个问题的过去与未来。

应该说,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但回想一下, 它对中日双边关系的现实影响在不同时期并不一样。直接与日本人打过仗的领导人, 即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在世时, 始终十分重视中日关系, 没有说因为存在历史问题就不能发展两国关系, 没有说因为有民族情绪就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中日关系。他们在中日关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在历史问题对现实还有着直接影响的情况下, 想方设法地发展中日关系, “民间先行, 以民促官”, 最终成功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那么, 在中日关系已经克服了巨大障碍并取得巨大发展之后, 为什么历史问题又会凸显出来, 时常成为两国关系的掣肘?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中日历史问题的凸显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 但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忘记我国老一代领导人所具有的那种远大的目光和广阔胸襟。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 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基本发生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20 世纪是一个对抗性的世纪, 上半叶是暴力对抗, 下半叶是冷战。其实冷战也是某种进步, 毕竟是非暴力的对抗, 但仍是对抗。进入 21 世纪, 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一个非对抗性的时代, 有竞争有合作。我们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思考也要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十分重要, 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 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大局出发, 我们所期待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对历史与未来的更广泛的共识。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直面历史, 谋求共识, 面向未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读后

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非常多, 仅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我自己在日本、在中国就参加过多次, 但仍是众多的中日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中很少的一部分。1987 年, 在东京和京都举办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 中国学者以刘大年先生为首到日本去, 从东京开到京都, 在东京有卫藤沈吉教授接待, 在京都有井上清教授接待, 这次会议以卢沟桥事变为话题, 中日学者之间有很好的对话, 会后有论文集出版。之后, 这种讨论会非常多。我本人就曾经参与组织过多次。这种讨论会, 是纯粹的学术交流, 当然也是各国学者的对话, 也有争鸣, 但基本上是各国学者各自阐述自己的意见, 各说各话。2006 年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 与上述这些讨论会, 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因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在两国政府首脑的倡议下, 在两国外交总局的推动下

进行的,这就规定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官方背景下的学术行为,可以说是中日关系问题上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第二管道。再是,这次共同研究,双方学者有机会坐在一起,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相互认可的讨论题目,然后双方分别约请历史学者就同一题目撰写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初稿完成后,中日双方委员还一起坐下来,对研究报告初稿进行探讨,相互琢磨、磋商,彼此对如何修订对方的文稿提出意见。尽管研究报告初稿是双方学者分别写出的,经过双方委员交换意见后的修订稿,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能就容纳了对方的意见和观点。这种方式 and 过去的对话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共同研究。

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之间绕不开的话题。为了东亚的和平,中日两国政府把历史问题交给学者去讨论,是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做法。2004年之前,中日两国政府就如何开展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也有过尝试。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日本议会通过了拨款对战前历史进行研究的决议。日本外务省要求中国外交部协助。1998—2004年,中日双方在政府的推动下做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还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开始由刘大年为召集人,刘大年去世后,由我为召集人。日本方面在日中友好会馆成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还成立了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座长是隅谷三喜男,隅谷去世后是安藤彦太郎代理。中国外交部当时不同意叫共同研究,我们当时的用词准确地叫“协助”,由中方历史学者“协助”日方历史学者进行历史研究。当时采取的形式,是日本和中国在国内招标,进行中日历史的课题研究,经费由日方提供。中方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迄今大概已出版结项后的课题成果30项,日方出版的可能更多。

日方的评议会和中方专家委员会,那时候都是10人,且岁数都比较大,均为七八十岁的人,胡德坤当时是最年轻的,我也是比较年轻的。两个国家的委员会,每年开会,彬彬有礼,非常客气,但没有就中国历史问题直接碰撞,所讨论的问题多半是事务性的。应该说,这次长达7年的合作,还不是真正的共同研究,但它为此后的共同历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中日关系,在小泉首相时期,是政治上不热,经济上不冷。所以从2003到2005年,中日两国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止步不前。经过了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两国政治关系呈现回暖态势。这以后才提出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课题。

我看了一下中日双方发表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其中的近代史部分,觉得中日学者之间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上有接近的趋势。日本学者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得出的研究结论,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和右翼学者完全不一样。

我举几个例子。譬如九一八事变,日方学者记述:1931年9月18日晚上,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的线路被炸坏。该事件的主谋者是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担任铁路守备的关东军将此视为中国军队所为,宣称自卫,一口气占领了奉天。这样的记述,是符合事实的,也是与中方学者的看法大体一致的。

再如卢沟桥事变,日方学者承认是卢沟桥事变导致了全面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导致了中国的抗战。中方学者指出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在丰台,丰台不是日军的合法驻地,这一点,日方学者回避了。我觉得指出丰台不是日军的合法驻地这一点还不够,实际上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方可在天津驻兵,日军指挥部设在天津海光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扩大对华侵略,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冀、察、平、津一带,并且非法扩大中国驻屯军,把驻屯军分驻于丰台,日军进驻丰台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是违约的,《辛丑条约》没有规定丰台可以驻扎外国军人。

过去,中日学者有谁先开第一枪的争论。我个人看法,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即使是中国先开枪,也是中国有理,因为中国士兵在自己的领土上打击非法驻扎的外国军队完全是合理合

法的。

又如南京大屠杀,中日双方的研究报告,都没有对南京大屠杀本身做过详细的研究论证,但双方都承认存在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对于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日方学者引证东京审判提出 20 万人死亡的数字,南京审判提出 30 万人死亡的数字,还引述有的日本学者得出的其他数字;中国学者引证东京审判提出 20 万人死亡的数字,南京审判提出 30 万人死亡的数字。其实,中国学者还可以引证日本学者洞富雄的研究,洞富雄通过研究得出了 20 万人的死亡数字。中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大体上已经取得共识。至于翔实的研究论证,不是这个研究报告的任务,自不待言。

再如太平洋战争,中日学者在这里各有一部分谈太平洋战争,日本学者使用的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概念,这点是和右翼学者不一样的。我曾去东京看了靖国神社,游就馆里展出了日本历史,其中讲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然后讲大东亚战争,说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军队为了反对欧美,解放亚洲各国被迫发动的战争,这是右翼传统的观点。但是,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日本学者没有采用大东亚战争的概念,这就和中国学者大体上靠近。

从这几点看,中日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大体上已经取得共识。至于同一报告的不同撰写者,由于各自学术素养不一样,在论证表述、引证方式上不大一致,是不必强求的。

三年以来,中日双方历史学者在近代历史认识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共同研究在中日历史关系的大关节上取得了一定共识,这是不容易的,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分歧当然也是有的,我们不能指望一次共同研究解决所有历史认识问题。如何利用这个研究报告,引导中日两国的民众,正确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纠葛,还要下一些功夫。

我期望,通过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两国学者应把共同研究所取得的核心共识认真整理一下,向各自政府作出一个负责任的报告,提供各自政府参考。中日两国关系要向前发展,要谋求和平、互利、双赢,要做的事情很多。日本政要、阁员不要老拿历史问题说事,历史问题让历史学家去研究。

(责任编辑:徐志民)